

俞樟华 等著

古代传记 真实论



中国文史出版社

俞樟华 等著

古代传记真实论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传记真实论 / 俞樟华等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34 - 4126 - 4

I. ①古… II. ①俞… III. ①传记文学 - 人物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120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6860 号

责任编辑: 王文运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10111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25 字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传记真实的意义	15
一、传记真实才能令人信服	15
二、传记真实才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24
三、传记失真的危害	36
第二章 传记“实录”论	39
一、班固的“实录”论	39
二、《史记》的实录贯彻程度	48
三、实录论的影响	65
第三章 陈寿“索米”、魏收“秽史”与韩愈“谤墓”的是是非非	83
一、陈寿“索米”	84
二、魏收“秽史”	94
三、韩愈“谤墓”	114
第四章 刘知几论“直书”与“曲笔”	125
一、直书论	125
二、曲笔论	141
第五章 材料真实是传记真实的基础	149
一、广收博采——材料的搜集	150
二、去伪存真——材料的考证	156
三、去粗取精——材料的使用	164

第六章 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	172
一、传记失真与传记作者的关系	173
二、传记作者是传记真实的捍卫者	184
第七章 传记真实与小说真实	196
一、传记与小说的关系	196
二、“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216
第八章 传记文学的艺术加工	225
一、主题的确立	225
二、人物特点的把握	227
三、布局谋篇，进行艺术构思	228
四、合理的想象和虚构	230
五、细节描写	232
六、心理活动描写	235
七、对话语言的设计	239
八、语言运用技巧	242
余论：真实是传记永恒的追求	246
附录：古代传记理论资料选辑	258
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386

绪 论

传记文学作为人类生命、人类文明的一种载体，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并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正史”的先河。于是，这一文体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书写中从未间断，造就了皇皇正史中数不胜数的帝王将相、忠臣名将，使之名垂青史；同时也鞭挞奸佞丑恶、贪淫残暴，使之遗臭万年。《史记》与模仿它的历史著作所组成的史传，以及名目繁多的杂传、类传、专传一起，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社会实践，记录了人类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记录了人类生命的伟大历程和探索足迹，记录了人之为人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真实地记录了永恒的历史丰碑，公正地记录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讲，传记堪为我国古代文学的骄傲。但是，我国古代传记理论的研究却颇为滞后。五四以后，我国有识之士放眼世界，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兴起，不仅出现了一批新传记作者，而且国外的优秀传记作品也开始传入我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传记文学的兴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传记研究也日益昌盛，而其中的关键性问题——传记真实理论也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然而，传记创作要不要真实，似乎已成定论，其实不然。传记真实研究既是学科研究的前沿，也是传记研究的雷区，更是研究传记文学绕不过去的关卡。要想为传记真实研究画上圆满的句号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而研究中国古代传记真实性理论，首先要了解当前传记真实的研究现状。

尽管自《史记》以来，我国传记历史有两千年之久，但是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才诞生，而将“传记

文学”作为一种独立于史的文学样式进行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至今不过百年。传记文学的发展在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传记文学的研究则更是举步维艰。传记理论的滞后必然阻碍传记的健康发展。传记真实理论的研究亦在这种状况下不断深化发展。传记真实研究大体上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发轫滥觞期：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赞美司马迁《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开始，古代关于传记真实性的讨论就已经拉开了序幕。魏晋南北朝时，零星的传记理论文章已经出现，如曹丕《典论·论文》谓“铭诔尚实”，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称赞《史记》“实录无隐”等。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传文学理论著作，其《直书》和《曲笔》篇对传记真实性原则作出了重要论述。宋元时期由于史学、文学理论和批评经验的不断积累，极大地推动了对传记文学的认识和研究，散见于古代研究者文章中的传记真实理论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明清时期的传记理论则摆脱了理学桎梏的束缚，出现一些新的观念。章学诚《文史通义》则表现出中国传记文体意识的成熟，另外，章学诚还突破儒家“隐讳文化”的传统，提出“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①的真实美学观。这个时期时间跨度大，研究评论过于琐碎，零星散见于纲目迥异的文学著作，但是正是这些东西开始了我国传记真实性研究的先河，为现代传记理论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拓荒起步期：作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现代传记理论兴起的转型期。其中，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作为该时期的中坚力量，提出了一些传记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使得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得以继往承前、开拓进取，又兼容并蓄、融汇中西。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历史，开创纪传体样式之后，史传合一成为定体，以后历代均沿袭此体。在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中，传记一般也理所当然地被归入到“史部”。“新史学”的拓荒者梁启超作为中国传记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他将传记纳入史学范畴，认为传记必须绝对忠实于历史。所谓忠实，就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①。胡适为张謇先生的传记写序时认为，“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②。现代传记的开创者之一朱东润先生在其传记作品《张居正大传》序言中总结出十四个字，即传记要“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③的真实性原则。当然，中国古代文史不分，许多优秀的传记作品也不乏鲜明的文学特征，但作为历史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传记写作往往也就格外注重史鉴的功能。故而，胡适、郁达夫等人则在将传记归属于文学的同时，强调文学性与真实性的同等重要性。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言论在此后近百年的传记理论探讨中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人们一直对如何把握传记的文学性与真实性尺度，传记写作是否允许艺术虚构等问题进行争论。

徘徊探索期：这个时期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后，传记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对于传记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传记真实性这一关键性问题方面。20世纪50年代，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便引起传记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文艺报》1956年第22期发表了张羽的《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和苏中的《传记文学的“真实”》文章。苏中的《传记文学的“真实”》认为“复杂生活的更高的真实”要比“细节都很真实”来得更重要，如果作品“对真实生活的复杂性揭示得并不不够”，“即或是细节都很真实，但也很难说这样的作品的真实性很高”，因而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不应“太多计较某些枝节问题”。苏中的“真实”是允许一定细节虚构的“真实”，是“生活本质”的“真实”，代表了那时的主流话语。井岩盾发表在1959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的文章《真实和虚构——关于特写、传记、回忆录等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指出：“特写、传记、回忆录等这一类文学作品，必须严格地遵循真人真事这条原则，决不能够容许虚构。”井岩盾将虚构完全剔除于传记创作之外，继承了梁启超的学术观点。20世纪60年代初，周作人在自传《知堂回想录》的后序中指出，“这‘真实与诗’乃是歌德所作自叙传的名称，我觉得这名称很好，正足以代表自叙传所有的两种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页。

② 胡适序、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1年版。

③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成分”，“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辞描写的地方”^①。在这里，周作人明确提出传记创作首先必须描写“事实”，其次，还必须有“诗性”，即要有一定的文学修辞性。至于修辞或虚构该掌握怎样的“度”，周作人没有更细致地剖析。同样完成于60年代初的是朱东润的《陆游传》，作者在《自序》中说：“传记中的传主，无论作者主观的意图如何力求和史实符合，其实一切叙述都必须通过作者的认识，所以传主是不是和史实符合，还要依靠作者的认识。因此传记文学中的传主，正和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作者创造的成果。所不同的在于传记文学的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学习，求得对于传主的全面认识。”^②另外，全展的《试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王泰栋的《略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石玉山的《漫议传记文学的真实性》等论文，都对传记的真实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论文均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但是，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传记文学理论的收获是不多的，对于传记真实性的认识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发展。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传记真实性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填补了我国传记研究的许多空白。首先，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成就的研究专著，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理论系统性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传记研究的规模和深度。相继出版的有陈兰村、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论稿》（1991），韩兆琦的《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朱文华的《传记通论》（1993），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1993），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1994），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编《传记文学研究》（1997），曾果伟编《传记文学研究》（1997），李祥年的《人的大写——中国史传文化》（1997），韩兆琦的《中国传记艺术》（1998），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论》（1999），郭丹的《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1999），李战子的《语言的人际元功能新探——自传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2000），俞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2000），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2000），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论》和《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2003），赵白生的《传记文学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6页。

② 朱东润《陆游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理论》(2003),何元智、朱兴榜的《中西传记文学研究》(2003),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2003),陈杰的《传记文学纵横谈》(2003),熊明的《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2004),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2004),俞樟华等的《古代杂传研究》(2005),俞樟华的《传记文学谈薮》(2007),史素昭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2009),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和《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2009),郭久麟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2010),李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2010)、俞樟华、邱江宁的《清代传记研究》(2013)等。在这些专著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关于传记真实性的问题,像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专门论述了真实与虚构问题;俞樟华在《古代杂传研究》中,用十余万字的篇幅,对传记真实的意义、传记真实的传统、传记材料的真实、传记失真的因素、传记实录与文学、传记真实与艺术加工等问题作了深入阐述。其次,传记理论研究的方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且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80年代至今,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依然是学界探讨的焦点问题。赵白生引证西方作家、批评家对传记的真实性的质疑,从传记人物、传记叙事和传记作家这几个角度全面地探讨了传记的虚构性,并指出:“事实上,比较公允、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顾此失彼或重彼轻此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并且,“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入手,我们都看到了相同的结论:传记具有不可回避的虚构性”。^①胡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了《虚构是传记的灵性所在》、《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和《虚构在纪实中穿行——我的传记立场》等系列论文,再三提出了她对传记文学真实性的看法。这是传记真实性和虚构性研究下激烈碰撞产生的火花。赵白生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的《“我与我周旋”——自传事实的内涵》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自传文虽然表现了丰富各异的自我,但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自传事实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展示自我生成

^① 赵白生《传记里的故事——试论传记的虚构性》,《国外文学(季刊)》1997年第2期。

的事实和经验化的事实。自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的头十年，传记真实理论的研究论文也呈现出大发展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关于传记理论的研究性论文近几年来每年都在百篇以上。也出现了一些高校设置特色科目专门研究传记文学及其理论，例如，复旦大学是全国唯一有传记文学博士点的高校，而浙江师范大学是全国唯一招收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的高校，并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设立传记研究专栏；再如《荆楚理工学院学报》和《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也设立传记文学研究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栏等。还有自1999年开始举办的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学术年会和香港传记文学研讨会的召开都涉及传记真实这一敏感话题，至今已召开十几届的会议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极大地促进了传记理论及其真实性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单看近百年的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史，不难发现，在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的同时，传记研究方向比较集中，核心问题始终是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与之相关的“传记和传记文学的区别”、“真实与虚构的论争”等问题也一直是传记理论家探讨的焦点。传记真实论研究在当代的开拓必然依据这个大形势并借用传统和西方的研究方法，继续挖掘下去。

那么，传记真实的研究方法是必须阐明的。中国自来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创作和研究，传统的研究偏重于寻章摘句，往往立意肤浅，不得要领。因此，现阶段传记真实的研究必须秉承以下基本要求：第一，继承和发展传统研究方法的精华部分；第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第三，借鉴与运用新方法改良我们的研究。由此而来，传记真实研究的趋势必然在新时期焕然生彩。

我们知道，传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对其属性的讨论亦在无穷的争论之中，理所当然地存在不同意见和声音，诸如传记的历史属性说、文学属性说、文史结合说、文史分离说等。中国古时传记是归纳在历史范畴之内的，最先让传记文学从史学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朱东润先生认为，传记文学是介乎文史之间的一个独特艺术类型，它结合了史学和文学的特性而独立存在。他将传记文学界定为结合史学与文学的特性而独立存在的艺术门类，将刻画和再现真实人物的丰富性格作为它的主要目的。在性质的确定上，他强调传记应脱离传统史学的规范；在写作的态度上，却又强调史料的考辨、运用，做到严谨有据，反对向小

说靠拢。所以传记存在着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又因为传记所载的人物必是社会上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它的文体特点就是为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传，让他们能够千古流传。所谓传记，即是“记载事迹，以传于世”^①。所以，必须要求真实。再者，在古代中国“文史哲不分”的文化样式下，我国古代的文论、诗论和史论，都十分强调真实性，古代文论要说到它，古代的史论也经常提到它，加上它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传记对于真实这一特质的要求自然就比一般的文体要更严格，更突出。

章学诚在论述历史真实和文学笔法时讲道：“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②但是不可“舍本而逐末”，故而，推及传记真实，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文学的真实，或者说首先是历史的真实，其次是文学的真实，它依赖于材料的真实并形成于创作的真实，它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相对的真实，它只能无限地接近绝对的真实而永远不能达到绝对真实，这个相对真实考验对尺度的把握。文学创作原本就是建立在丰富想象的基础之上的，而想象的结果就难免虚构，但是就文学传记来说，这应该是限制在严格的范围之内的。虚构成分过大则导致传记失实失真，失真的传记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严格意义上讲失真的传记就不能称之为传记，因为它走向了虚构，而虚构正是小说的品质。

简而言之，真实是传记与生俱来的特点。正如诗歌的产生为了抒情言志，传记的诞生就必然要客观真实。因为传记文学所写的人物是社会上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它的文体特点就是为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传，让他们能够千古流传。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在《新闻评论》中曾说过：“只有传记是真实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真实性是传记的生命。真实之于传记的意义不言而喻，可谓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传记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和创作事实。对人物的记述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

①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原载“《文学》二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7月版。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否则，不真不能够感人，不真不能够流传，终被历史风沙所湮没，被人所遗忘。

可是，当传记文学作品由传记的“真实性”向“文学性”靠拢的时候，就产生了两种对传记文学创作的不同观点。我们应当看到，传记以历史为基础，但是它又离不开文学。传记文学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文史”结合的特点，因而，就必须思考传记写作的虚构问题。对于传记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学界存在较大分歧。学者石玉山曾说：“传记文学是为真人立传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传记文学的重要情节、乃至那些带有关键性的细节，是不能有一点差错的，否则就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赖。如果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的话，那么相反地，有了虚构就没有了传记文学。”^① 朱文华也认为：“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历史学范畴，而不应划为文学范畴。”“如果认定传记作品属于文学范畴，那么其最终必然导致传记作品因虚假而失去固有的价值。”^② 与之对应的观点认为：虚构是传记文学的灵性所在。传记的“真实”是经过改写了的“文学的真实”，但它同样是一种“真实”，而绝不是反真实的。我们必须承认，传记就作用上来说给人看的，而传记的读者，很少有人对传记中历史人物进行专门研究，绝大多数人仅仅是为了读一读，满足他们猎奇的心理，或者从中领悟到某些东西。因此，读者对文学性和可读性的要求也就要求了传记作者必须有所虚构，否则传记文学怎么做到好看呢？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传记真实似乎又遇到一个难解的死扣。

传记真实在“求真”和“虚构”的双重命题下，似乎“持其两端，允执其中”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远非如此。因此，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传记真实性问题，希望能将有关传记真实性的研究推进一步。简述如下：

第一，传记真实是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

中国作为传记大国，两千多年来，传记真实的要求薪火相传。可以说，传记真实是我国传记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传记的求真精神，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史家。而“实录”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扬雄所著的《法

^① 石玉山《漫议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兼评当前传记文学写作中的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

^② 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言·重黎》篇，后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较为具体地阐释了什么是“实录”：“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先秦到清朝，无论史学家还是文人墨客，都不乏传记真实论的拥趸者。这个事实就最好地说明了传记真实是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实录”成为中国传记写作的一项铁定原则，董狐、南史秉笔直书的精神也一直是后代传记作家的楷模。举例来说，为了能真正地达到褒贬善恶的效果，刘知几提出了“直笔”、“直书”的要求，提倡和表彰秉笔直书的史家和史书，谴责以曲笔为史的史家，对“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的现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通过《史通》可以管窥《史记》实录论的贯彻之深与影响之远。甚至欧阳修在“实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事信”的要求，都可以看作是对“实录”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传记真实无疑是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

第二，真实是传记的生命。

提纲挈领地讲，研究传记真实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真实是传记的生命。所谓传记真实既不是那种纯客观的叙述，也不是对传主的事迹有闻必录，作流水账似的简单罗列，而是传记作者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认识水平，对人物事迹经过一番整理精选，从而把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事迹材料挑选出来，进行认识描写，而将那些可有可无、繁琐平庸的事迹剔除掉，这样就可以突出这个历史人物的最主要的特点，最本质的东西，只是写作这些事迹时，不能因个人的主观感情而夸大或缩小某些事实。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德”篇就讽刺虚假文辞造成的严重危害，“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①。因而，传记真实在保证传主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又能达到文学真实，这是传记真实的最高要求。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没有真实性的传记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无法传世的。古往今来，凡是严肃的、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家，无不视真实为传记文学的第一生命，不仅在传记创作中异常重视真实问题，而且把真实作为传记写作的崇高目标来追求、来努力。

第三，传记失真的原因与表现。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郁达夫在《传记文学》一文中说：“中国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以来，直到现在，盛行着的，总还是列传式的那一套老花样。若论变体，则子孙为祖宗饰门面的墓志、哀启、行述之类，所谓谀墓之文，或者庶乎近之。可是这些，也总是千篇一律，人人死后，一例都是智仁皆备的完人，从没有看见过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神文字。”^① 胡适说得更尖刻，“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记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诽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辩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而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② 胡适和郁达夫的观点都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传记失真的现象古已有之，且传记失真是难免的。古代学者在强调传记的真实意义的同时，还对古代传记作品失真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另外，本书还详细介绍中国古代传记中存在几个失真的典型行为，例如，陈寿“索米”，魏收“秽史”和韩愈“谀墓”等。

当然，谈到传记失真就必然谈到传记失真的重大危害。如果传记作品出现的人物和事件是虚构的，不符合历史真实，那么，这个传记也就失去了生命。如果读者认定某些传记是虚假伪造的，这样的传记也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传记的人物与重要事件都应符合历史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传记文学与小说一类的虚构性作品划出了界限。历史小说所写的人物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但人物的事迹是作者虚构或夸大的，只能算是小说，还不是传记。

第四，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

传记作者是搜集传主材料，进行传记创作的行为者，理应是传记真实的践行者和捍卫者，但是诸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可能导致传记的失

① 郁达夫《传记文学》，《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原载1933年9月4日《申报·自由谈》。

② 胡适序，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1年版。

真,因而,传记作者应该正确处理好传记材料和传记创作的关系。所以,传记作者的素质和努力是传记成败的关键。

莫洛亚认为传记家在写传记之前应该抱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常人,我得掌握关于他的大量文献与实物资料,以便撰写一部真实的传记。在动笔之前,我绝不虚构,而是仅仅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经过长期周密思考方才体会到的东西,并且准备根据新发现的事实来随时修改它。’我们反对传记作者依靠先入为主的看法作出判断,而要求他们从考察事实出发,来表达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随后还要经过重新独立研究的检验以及谨慎与冷静地处理,我们需要运用一切文献材料来阐发主人公的性格。”^①由此,应当考量传记作者与传记材料和传记作品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容易地接近传记真实。其一,材料真实是传记真实的基础;其二,传记失真与传记作者脱不开关系;其三,传记作者是传记真实的践行者与捍卫者。

总之,要使传记真实可靠,传记作者首先要对传记材料进行认真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有“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要有敢于“实录”的勇气。最后,传记作者不能过分地对传记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务必以捍卫传记真实为第一要务。

第五,传记真实既是历史真实又是文学真实。

陈兰村先生曾指出,“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既受外域传记文学的明显影响,又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并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仍保持了自己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②传记文学的真实,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文学的真实。强调历史的真实,就是指传记所写的所有的人物和基本事实都应该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而且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摹写,“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③但

① [法]莫洛亚《论当代传记文学》,刘可、程为坤译,《传记文学》1987年第4期。

② 陈兰村《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位置及其基本走向》,《学术论坛》1999年第3期。

③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原载“《文学》二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7月版。

是只有历史的真实，而没有文学的真实，传记作品就不能感动人，就不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传记文学应该是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有机统一的产物，那种只强调历史的真实，或者只强调文学的真实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所以，郁达夫认为“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终可以见得实，说得像”^①，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又不失文学美感。因而，全展为传记真实属性作出如下判定，即“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真实是文学真实的基础，文学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升华，它来源于历史真实，是经过传记作家提炼概括的历史真实的升华。传记作品如果达不到历史的真实，就无法达到文学的真实。”^② 传记文学的真实不是绝对的真实，而是相对的真实。传记在描写人物时，不可能把这个人物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一点不落地全部记录下来，他所写的事迹，是经过选择的，是有所剪裁的，在这个选择和剪裁过程中，已经舍弃了许多材料，尽管传记作家所写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无误的，它也已经不是这个人物的全部事迹，这里面本身就已经不是绝对的真实了。更何况传记作家所写的人物大都是已经死去的历史人物，传记作家既不可能亲眼目睹其人的音容状貌，也无法访问传主的亲朋好友，他只能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来作出分析、判断，然后下笔成文。即使是那些自己写自己的自传作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真实。由于记忆方面的原因，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和说过的所有话语都记得丝毫不差，并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发生疏漏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要绝对真实是不符合实际的。再说一味强调“绝对真实”，必然导致自然主义的描写，这不仅不能提高传记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反而会影响传记文学的社会价值。

我们不能用绝对真实的标准来衡量传记文学，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它的真实性是不可怀疑的，但绝不是较真到底的真实。首先来说，贯穿整个古代时期，从统治者到一般的文人学者，几乎一致强调传记文

①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原载“《文学》二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7月版。

② 全展《试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传记文学》1987年第2期。